

## 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与中亚地区一体化\*

周明\*\*

**【内容提要】**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后，乌便将修复和发展与中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作为乌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通过调整中亚地区政策，乌与其他四个中亚邻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显著改善。这种改善为中亚地区一体化的重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由于乌外交政策的发展方向仍存在不确定性、中亚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集体身份的形成困难重重、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所持的立场不明朗等原因，导致重获生机后的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仍存在许多变数。

**【关键词】**乌兹别克斯坦外交 中亚一体化 米尔济约耶夫 中亚五国

**【中图分类号】**D83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3-0076(30)

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后，代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于2016年12月4日正式就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担任总统后，对乌国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乌各方面发生了显著改变，同时也使整个中亚地区的形势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亚地区一体化重现曙光。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回顾米尔济约耶夫自上台（担任代总统）以来乌与其他四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与塔吉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7VDL003）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项目批准号：18LZUJBWTD003）和自由探索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同区域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8LZUJBWZY004）的资助。

\*\* 周明，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

斯坦)之间关系改善的状况,探讨乌政策调整与中亚地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对中亚地区一体化仍然面临的挑战进行简要分析。在此之前,需要对米尔济约耶夫对乌内外政策做出重要调整的原因稍作分析,以为本文分析作必要铺垫。

## 一、米尔济约耶夫能够对乌内外政策进行调整的原因

自执政以来,米尔济约耶夫在国内启动了一系列改革,以回应百姓的诉求,并致力于为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宁注入新的动力。在政治领域,米尔济约耶夫尝试致力于转变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作风,加强政府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效率,打击严重的腐败现象;在经济领域,乌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减少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经济区战略,期望盘活国家经济活力;在安全和司法领域,对国家安全部门进行改革,并有限度地放松政府管制,同时启动司法体制与司法教育改革,以更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在社会服务领域,基于“政府为民众服务”的理念,致力于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回应民众对政府的诉求,并鼓励宗教宽容和族际和谐,以激发社会活力。<sup>①</sup>客观而言,米尔济约耶夫启动的诸多国内改革措施大体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为巩固其执政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对外政策方面,米尔济约耶夫同样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在坚持卡里莫夫政府时期“自主”外交政策原则——如不结盟、不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在乌国土、不允许乌军队驻扎他国国土等——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对外关系,力图突破卡里莫夫政府时期乌在国际社会中相对孤立的

---

<sup>①</sup> 对米尔济约耶夫国内改革措施的介绍,可参见韩隽、艾丽菲热·艾斯卡尔:“米尔济约耶夫主政的乌兹别克斯坦:变革还是沿袭?”,《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71-74页;Mjusa Sever, *Judicial and Governance Reform in Uzbekistan*,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Silk Road Paper, March 2018; Anthony C. Bowyer, “Political Reform in Mirziyoyev’s Uzbekistan: Elections, Political Parties & Civil Society”,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Silk Road Paper, March 2018.

国际形象。<sup>①</sup>除了改善和巩固与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外，米尔济约耶夫也积极发展与韩国、土耳其、伊朗等域外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过，在米尔济约耶夫的外交布局中，最重要或最优先的方向是其周边国家，这也是米尔济约耶夫政府外交政策中着力最深的方向。<sup>②</sup>乌新政府对其周边外交所做的调整，令乌与中亚邻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且带动了整个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回暖，并重新激发了中亚国家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希望甚至信心。

米尔济约耶夫政府之所以能够对其内外政策做出较大调整，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米尔济约耶夫本人的角色转变以及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发展的需要。首先是米尔济约耶夫本人的原因。米尔济约耶夫出生于 1957 年。苏联解体之时，他担任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委员和苏维埃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米尔济约耶夫曾担任塔什干市米尔佐-兀鲁别克区区长（1992 年），1996-2001 年间他担任吉扎克州州长，2001-2003 年任撒马尔罕州州长，2003 年米尔济约耶夫被任命为总理，并分别于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三次连任。<sup>③</sup>从其履历可以看出，米尔济约耶夫长期在卡里莫夫身边工作，所处位置使其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情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而他之所以能长期担任乌政府总理，除了对卡里莫夫的忠诚，或许还与他拥有较强的治国理政能力、丰富的政治经验及其展示出的“低调、专业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有关。<sup>④</sup>

---

① 关于卡里莫夫政府时期乌外交政策，可参见 Leila Kazemi, “Domestic Sources of Uzbekistan’s Foreign Policy, 1991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3, Vol.56, No.2, pp.205-216; Luca Anceschi, “Integrating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Cases of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0, Vol.29, No.2, pp.143-158; Dina Rome Spechler and Martin C. Spechl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Uzbekistan: Sources, Objectives and Outcomes: 1991-2009”,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0, Vol.29, No.2, pp. 159-170; 等。

② 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五国相邻。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讨论乌新政府政策调整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影响，故这里将不对乌与阿富汗的关系进行分析。

③ 关于米尔济约耶夫的履历，可参见王明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国际研究参考》，2017 年第 4 期，第 49 页；维基百科，“Shavkat Mirziyoyev”，[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avkat\\_Mirziyoyev](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avkat_Mirziyoyev)

④ 韩隽、艾丽菲热·艾斯卡尔：“米尔济约耶夫主政的乌兹别克斯坦：变革还是沿袭？”，第 70 页。

成为国家元首之后，米尔济约耶夫可以按照自身的执政理念对乌兹别克斯坦内外政策进行调整。由于卡里莫夫政府时期乌总统几乎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与较为封闭的政权性质，米尔济约耶夫虽身为总理，但他很大程度上仅扮演政策执行者的角色，无法决定或主导乌内外政策的走向。出于巩固个人地位的考虑，米尔济约耶夫在执政后不能仅对卡里莫夫的内外政策采取亦步亦趋的态度，而必须展示出有别于前者的执政风格，这或许是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重要初衷。另外，据国外媒体报道，米尔济约耶夫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和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实施的“零问题邻国政策”中受到启发，立志于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邓小平”，或许也有助于解释米尔济约耶夫为何对内启动多项改革、对外将与邻国改善关系视为优先外交方向。<sup>①</sup>不过，限于资料所限，人们对米尔济约耶夫执政理念的了解还很有限，很难准确判断其启动改革的动机仅仅是出于维护个人地位的工具理性考虑，还是基于对自由市场经济和积极自主外交政策的真诚拥护，抑或是出于对卡里莫夫政府时期内外政策的反思。从目前乌内外政策改革的状况来看，很难确定其中哪一种动机更为真实或居于主导地位。不过就效果而言，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以来，乌内外政策的确展示出了新面貌，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除了米尔济约耶夫个人原因，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形势的状况也要求乌启动必要的改革。在国内层面，卡里莫夫执政时期乌积累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众所周知，卡里莫夫执政时期尽管乌大体保持了国家稳定，但整体而言，乌是中亚五国中较为封闭、外部世界较难与之交往的国家。在政治上，卡里莫夫总统基于其个人权威和所依仗的强力机关，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权力制衡基本失效，舆论批评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如此一来，任人唯亲、腐败现象、内部权力斗争等现象并不鲜见，这不仅对乌政治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形象。<sup>②</sup>在经济领域，尽管乌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禀赋良好，但由于投

---

① Andrew Korybko, “Uzbekistan’s Mirziyoyev Is Undoing Karimov’s Legacy, And It’s About Time”, December 10, 2017, <https://orientalreview.org/2017/10/12/uzbekistans-mirziyoyev-is-undoing-karimovs-legacy-and-its-about-time/>

② 可参见 Neil J. Melvin, *Uzbekistan: Transi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on the Silk Road*, Amsterdam :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资环境遭人诟病，吸引外资的能力不强，从而导致其经济潜力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受到次贷金融危机、卢布危机及后续冲击的影响，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通货膨胀、失业率升高，这对乌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威胁。<sup>①</sup>在社会与安全领域，卡里莫夫政府实施严格的管制政策。从积极的方面讲，乌维护了国家的整体稳定；但从消极方面来看，这也导致乌社会的自由空间受到压缩，原本温和的政治与社会势力趋于激进，甚至为“三股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尤其是 2005 年后，乌面临的反恐、激进化形势趋于严峻，这与乌在“安集延事件”后采取的严厉社会管控制度有一定关联。总之，在卡里莫夫政府执政时期，乌积累了不少问题甚至矛盾，这种状况对保障乌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是不利的。民心思变，这也为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启动改革提供了民意基础。

在外交政策方面，乌同样有调整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必要性方面，乌宣称其实施的是“自主”和“多角度”的外交政策。<sup>②</sup>这种政策虽然一方面保障了乌的独立自主，但另一方面也让乌在国际社会显得孤立。实际上，乌奉行的外交政策比其宣称的政策原则复杂，在不同时期分别倚重不同的大国：如乌曾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维持着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90 年代中期至“9·11”事件前后，乌在很大程度上奉行大国等距离外交；“9·11”事件至 2005 年“安集延事件”之前，乌则与美国发展了一种“准盟友”关系；“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在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时，向中俄有所倾斜。乌外交政策的不时转向，客观上给乌与大国发展稳定关系造成了一定困扰，甚至导致大国对乌产生了不信任情绪。这与哈萨克斯坦虽然同样宣称

---

① 韩隽、艾丽菲热·艾斯卡尔：“米尔济约耶夫主政的乌兹别克斯坦：变革还是沿袭？”，第 68 页。

② Dina Rome Spechler and Martin C. Spechler, “Uzbekistan among the Great Powe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 Vol.42, No.3, pp.353-373; Aleksandr Pikalov, “Uzbekistan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A Balancing Act or a Multi-vectorial Approach?”,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4, Vol.33, No.3, pp.297-311; Bernardo Teles Fazendeiro, “Uzbekistan’s ‘Spirit’ of Self-reliance and 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TAPOich and interaction with Rus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5, Vol.34, No.4, pp.484-498.

奉行“多角度”政策但致力于保持与各大国的友好关系有所不同。<sup>①</sup>而乌兹别克斯坦的邻国政策也乏善可陈。无论与哪个邻国，乌兹别克斯坦与之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这种局面，既是导致中亚地区一体化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又使乌无法获得对外交往和启动对外开放的良好周边环境。在可行性方面，米尔济约耶夫对乌外交政策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洞若观火，相信也具有改变这种状况的强烈意愿，因此，当他担任总统并拥有了相应的权力之后，必然会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此外，米尔济约耶夫也意识到，对乌外交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尤其是改善乌与其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将能为乌国内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为国内改革注入必要的外部动力。或许基于这种考虑，执政后，米尔济约耶夫将改善乌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视为乌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

## 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邻国间关系的显著改善

米尔济约耶夫自担任乌兹别克斯坦代总统以来，便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与中亚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将此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2016年9月8日在向乌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米尔济约耶夫明确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活动的优先方向，是和我们国家利益有着密切联系的中亚地区”。<sup>②</sup>2017年2月初，乌批准和公布了《2017-2021年国家发展战略》。《战略》重申了中亚地区在乌外交战略中的优先地位，并强调需要围绕乌构建一个安全、稳定与睦邻带。<sup>③</sup>2017年9月19日，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上再次宣称，“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最优先的方向是中亚地

---

① 可参见 Reuel R. Hanks, “Multi-Vector Politics’ and Kazakhstan’s Emerging Role as a Geo-strategic Player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2009, Vol.11, No.3, pp.257-267; 周明：“地缘政治想象与获益动机——哈萨克斯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评估”，《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141-142页。

② 转引自焦一强：“‘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5页。

③ Richard Weitz, *Uzbekistan’s New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under New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 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Silk Road Paper, January 2018, p.10.

区”，“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中亚，这是我们的目标和核心任务”。<sup>①</sup>由此可见，在米尔济约耶夫调整后的乌外交政策中，中亚地区占据着最突出、最优先的位置。下文将对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以来，乌土、乌哈、乌吉、乌塔关系的发展状况进行简要梳理。

### （一）乌土关系

卡里莫夫总统在世时，仅在 2007 年访问过土库曼斯坦一次。整体而言，乌土关系不密切，而且停滞不前。而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仅 2017 年就访土三次（3 月 6-7 日、5 月 19-20 日、9 月），从而实现了乌土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三次访问中，3 月 6-7 日的首次访问最为引人注目。这是米尔济约耶夫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极富象征意义。首访选择土库曼斯坦，不仅表明乌重视中亚邻国的姿态，而且蕴涵着乌继承卡里莫夫总统坚持不结盟、不加入任何国际政治和军事集团的决心。这实际上向俄罗斯发出了一种信号：尽管乌新政府同样将改善乌俄关系视为重要目标，但首访选择土库曼斯坦，表明米尔济约耶夫无意改变卡里莫夫政府时期拒绝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安全、经济地区一体化组织的传统立场。

米尔济约耶夫首次访土，令乌土关系显著改善。在访问期间，米尔济约耶夫强调土是乌的亲密邻居和伙伴，并认为两国拥有共同命运，土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对此表示认同。不仅如此，双方都认为这次访问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这种乐观情绪不仅体现在言辞之中，而且切实地体现在双方所缔结的相关协议和所开展的合作行动中。在此次访问期间，乌土签署了《土乌联合声明》、《土乌战略合作条约》、《2018-2020 年经济合作条约》、《乌土关于进一步发展铁路交通备忘录》等文件。<sup>②</sup>双方还就乌向土出口化肥和农业机械、乌同意土电力途经乌向塔吉克斯坦出口、联合在阿姆河上修建铁路与公路桥梁等问题进行了磋商，<sup>③</sup>而且乌原则上表达了愿意参与土库曼斯坦-

---

① 李自国：“乌兹别克斯坦”，载孙力、肖斌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92 页。

② 同上，第 293 页。

③ Fozil Mashrab, “Uzbekistan Accords Turkmenistan Status of Closest Neighbor and Partner”,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4, No.36, March 16, 2017.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TAPI）管线的愿望。<sup>①</sup>此外，两国元首还出席了跨阿姆河公铁路通车仪式和象征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卡里莫夫纪念碑落成典礼。

米尔济约耶夫再访土库曼斯坦，为乌土关系发展积累了更多的互信。在5月第二次访土期间，米尔济约耶夫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双方已签署协议的落实。另外，双方还签署了有关电力过境运输、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的相关合作文件，并进一步讨论了在政治、贸易、投资与交通等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问题。米尔济约耶夫还承诺帮助推动 TAPI 天然气管线的兴建。9月，米尔济约耶夫应邀出席土举办的亚洲室内与武道运动会，对土进行第三次访问，以示对东道国举办国际赛事的支持。总之，通过高层互访对双方关系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乌土一扫多年关系停滞不前的阴霾，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

## （二）乌哈关系

乌哈均是中亚地区大国，两国关系对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乌是中亚五国中人口最多、武装力量最强、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均接壤的国家，而哈是五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分量，乌哈关系的好坏对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哈是乌在中亚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双方2016年的贸易额达到20亿美元。在政治层面，双方早在2013年7月就缔结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过乌议会直到该年12月才批准）。而且双方在稳定阿富汗局势、打击恐怖主义、保障中亚水资源合理利用等问题上开展了一些合作。但由于两国均有意成为中亚的领头国家，以致双方关系的发展存在一些障碍。这种局面，随着米尔济约耶夫成为乌总统之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2016年9月至今，乌哈关系迅速升温，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这种进展与双方所开展的首脑外交息息相关。2017年3月23-24日，米尔济约耶夫总统访哈；同年10月初，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乌进行回访。哈萨克斯坦

---

<sup>①</sup> Casey Michel, "Will Uzbekistan Join TAPI?", *The Diplomat*, May 23,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5/will-uzbekistan-join-tapi>

是米尔济约耶夫担任总统后出访的第二站，早于4月4-5日对俄罗斯访问，这说明乌政府的确是在贯彻将中亚地区作为其外交优先方向的承诺。纳扎尔巴耶夫对米尔济约耶夫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热情洋溢地表示：“我以兄弟般的情谊衷心地欢迎您，是因为，其一，这是您作为乌总统对哈的第一次访问；其二，您的访问发生在我们共同的美好节日纳乌鲁兹节期间及乌哈关系确立25周年之际”。<sup>①</sup>双方不仅对此次访问赋予极高的象征意义，而且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实质性的合作协定。在此期间，乌哈不仅签订了《进一步深化乌哈两国战略合作》、《巩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等7个重要文件，还于3月23日召开了有两国企业家参加的大型商务论坛，签署了合同金额高达1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乌哈两国元首的互访，极大地提升了双方关系，开启了双方合作的新篇章。通过首脑互访和各层级官员的会晤，乌哈在2017年就运输、贸易、油气过境运输、联合生产汽车和大型机械设备等达成了合作协议，乌还降低了哈农产品进口关税。此外，双方还研究了增开两国之间航班和哈向乌通过能源管线出口石油的可能性，并计划到2020年将双方贸易额提升到50亿美元。得益于双方政治关系的升温，以及米尔济约耶夫加大了乌对外开放力度，乌哈之间的经济合作在2017年取得了明显进展。仅2017年前7个月，双方贸易额即增长了35%。<sup>②</sup>不仅如此，乌哈友好关系的提升还外溢到了安全领域。2017年8月，哈国防部长访乌，双方签署了数个防御协定，其中包括一个开展联合训练和军事教育的军事协定。基于双方关系的显著改善，哈将2018定位为“乌兹别克斯坦年”，而乌将2019年定位为“哈萨克斯坦年”。<sup>③</sup>

### （三）乌吉关系

2017年，米尔济约耶夫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两次，从而使原本互不信任和猜忌的双边关系，重新走上了友好发展的轨道。2017年9月4-5日，米

---

① 转引自焦一强：“‘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8页。

② George Voloshin, “Closer Uzbekistan-Kazakhstan Ties Not Enough to Resolve Broader Regional Woes”,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4, No.125, October 6, 2017.

③ Richard Weitz, *Uzbekistan's New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under New Leadership*, pp.32-33.

尔济约耶夫首次访吉，这是乌总统时隔 17 年之后再次访吉。米尔济约耶夫访吉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借此改变卡里莫夫在任时与吉互不信任的状态，重建双方睦邻关系，落实在周边构建一个“安全、稳定与睦邻带”的目标。在此次访问期间，米尔济约耶夫与阿坦巴耶夫总统签署了划分两国之间 85% 边界的协定，即双方约 1300 公里边界中的 1170 公里。而这一成果的达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坦巴耶夫 2016 年 12 月对乌进行国事访问后，双方边界划分和勘界部门重启了中止八年的边界划分协商工作。在此之后，双方连续展开了 16 轮边界划分磋商会议，而边界协定的签署是这些磋商带来的具体成果。

乌米尔济约耶夫首次访吉还达成两项非常重要的成果。(1) 乌改变了对吉兴建水电站的坚决反对立场的。卡里莫夫反对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兴建水电站的立场众所周知，米尔济约耶夫对此作了较大调整。他认为中亚国家需要就水资源利用问题展开建设性的磋商，并在达成共识和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由上下游国家就兴建水电站的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基于这一立场，米尔济约耶夫在首次访吉期间就表示，乌不仅不反对吉修建卡姆巴尔阿塔(Kambar-Ata)水电站，而且由于该水电站的兴建与乌利害攸关，所以乌准备参与该水电站的建设。<sup>①</sup>(2) 乌推动吉重新启动中吉乌铁路的建设工作。建设中吉乌铁路的倡议于 1995 年就提出，但由于吉更希望兴建联通其南北地区的铁路，并认为相对于中乌两国吉从铁路中获益较少等原因，该倡议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sup>②</sup>在首次访吉期间，米尔济约耶夫通过承诺让吉在铁路兴建中获得更多收益，从而得到了吉方的同意，并宣布铁路将很快进入开工阶段。与此同时，米尔济约耶夫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公路倡议，即兴建一条从喀什经奥什抵达安集延的跨国公路。<sup>③</sup>米尔济约耶夫首次访吉达成的这两项重大成果，为乌吉关系发展赋予了新动力。

---

① Umida Hashimova, “Rapprochement With Kyrgyzstan: Mirziyaev’s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Achievement to Date”,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4, No.113, September 18, 2017.

② 曹伟：“‘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下的中—吉—乌铁路计划”，《中亚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47-62 页；Fozil Mashrab, “Bishkek Puts Brakes on China-Kyrgyzstan-Uzbekistan Railway”,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2, No.199, November 3, 2015.

③ Umida Hashimova, “Rapprochement With Kyrgyzstan: Mirziyaev’s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Achievement to Date”.

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乌吉均给予高度评价。米尔济约耶夫将吉称为“战略合作伙伴”，并表示他将致力于把两国边界打造为“友好边界”，而阿坦巴耶夫则认为此次访问“对于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而言是历史性事件”，“吉人民为此等待了 20 多年”。<sup>①</sup>领导人之间的互信，为两国开展实质性合作奠定了基础。吉新当选总统热恩别科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访乌，延续了此前两国友好合作的基本思路。在此背景下，乌吉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效。在政治层面上，双方先是于 2017 年 9 月通过了涉及解决彼此间争端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毒品和武器走私的总统联合声明。然后又于 2017 年 10 月 7 日阿坦巴耶夫访乌期间签署了《乌吉睦邻友好互信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从而为双方关系奠定了友好合作的基调。在元首交流的带动下，双方各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明显增多。在经济和人文交流层面，得益于 2016 年 10 月乌政府放宽对居民过境的限制，双方的经贸往来和人员流动变得密切。自米尔济约耶夫担任总统以来，乌吉贸易增长了一倍，乌在参与吉水电站建设问题上也取得了切实的进展。2017 年 10 月 6 日，乌兹别克斯坦水电能源公司与吉尔吉斯斯坦能源持股公司，正式签署了联合建造卡姆巴尔阿塔 1 号水电站的备忘录。乌吉关系的改善，为地区稳定做了积极贡献。

#### （四）乌塔关系

乌塔关系自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得到了大幅改善。在卡里莫夫总统任内，乌塔关系处于紧张甚至是对抗的状态。如，1999 年乌以防范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为由，在乌塔边境布雷；2001 年，乌针对塔公民实行签证制度；2009 年 12 月，乌禁止塔货运列车入境；2009 年，乌退出中亚统一电网，使塔电力紧张局面进一步恶化；乌激烈反对塔兴建罗贡水电站；塔总统拉赫蒙 2009 年公开向媒体表示，他曾两次当面怨怼卡里莫夫；塔外交部 2012 年发表报告，公开指责乌对其进行“封锁”；2012 年，卡里莫夫表示中亚地区如果发生战争将是由水资源争端引发等。尽管乌塔同处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

---

<sup>①</sup> Richard Weitz, *Uzbekistan's New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under New Leadership*, pp.33-34.

等地区合作机制之中，双方高层偶尔也对对方进行访问（如卡里莫夫总统曾于 2000 年访塔，这是其最后一次访塔），但关系紧张还是影响了双方的互利合作，也给地区合作投下了阴影。

随着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乌塔关系获得了长足发展。早在 2017 年 9 月 3 日，即卡里莫夫总统逝世后的第二天，塔总统拉赫蒙即出席了在撒马尔罕举行的卡里莫夫葬礼，他也是出席该活动的三个国家元首之一。在当时，拉赫蒙即与米尔济约耶夫有过会晤。拉赫蒙此举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拉赫蒙对逝者卡里莫夫总统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向乌传递了塔有意改善乌塔关系的重要信息。自此之后，乌塔互动频繁，关系改善趋势明显。如 2016 年 9 月，乌外交部部长卡米洛夫到访杜尚别，表达了“重启”双方关系的愿望；2016 年 10 月，塔宣布重启罗贡水电站的建设，乌对此保持了沉默，并未像往常一样予以反对；2017 年 4 月，中断了 25 年之久的杜尚别与塔什干之间的直飞航班重新启动；2017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杜尚别举办第一届为期五天的乌兹别克文化节；2017 年 7 月，卡米洛夫明确表示乌政府不反对罗贡水电站的兴建；2017 年 11 月，乌塔协商了双方实现能源网络互联以及乌重新向塔供应天然气的问题；2018 年 2 月，塔国家电力公司与乌政府达成在夏季向乌提供电力的协定；2018 年 3 月 1 日，自 2001 年起被关闭的十个边境口岸重新开放，等等。<sup>①</sup>这些事件显示，乌塔关系正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改善。

米尔济约耶夫 2018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访塔，是双方关系改善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乌塔此前采取的一系列友好举措，为米尔济约耶夫访塔铺平了道路。如，乌塔贸易额从 2016 年的 7000 万美元，迅速增长到 2017 年的 2.4 亿美元，充分展示了中亚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国家间经济合作成效之间的密切关系；而 2017 年 6 月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长阿布杜萨罗姆·阿兹佐夫（Abdusalom Azizov）访塔，就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毒品走私等问题与塔进行磋商，这是 20 多年来的第一次，意味着双方关系的改善已经外溢到了安全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塔虽然是米尔济约耶夫最

---

<sup>①</sup> Edward Lem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zbek-Tajik Relationship”,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5, No.37, March 12, 2018; Richard Weitz, *Uzbekistan's New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under New Leadership*, pp.36-37.

后访问的中亚邻国，但取得的成果相当丰富。在访塔期间，双方签署了 27 个协定，合同金额达 1.4 亿美元；米尔济约耶夫与拉赫蒙还共同出席了自 2012 年以来停运的加拉巴-阿穆赞格-胡沙迪（Galaba-Amuzang-Khushadi）铁路重新联通的仪式。不仅如此，双方还签署了为对方公民提供为期 30 天的免签证的协议。更富有象征与实质性意义的是，乌总统明确宣布，乌不仅不反对罗贡水电站的兴建，而且还准备向其顺利建成提供必要支持。种种迹象表明，乌塔关系的改善或许不只是临时现象，更有可能是双方关系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开始。

总之，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得益于乌外交政策的调整与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的积极运筹，乌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与卡里莫夫在任时乌孤立和封闭并与其他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明显紧张不同，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乌在“中亚地区优先”这一外交原则指导下，通过首脑外交、外长访问等机制加强了与其他中亚国家之间的外交互动，迅速修复或提升了乌与邻国的关系，成效显著。而这种成效的出现，显然离不开米尔济约耶夫所做的诸多努力。据统计，仅 2017 年，米尔济约耶夫就出访了 60 多个国家，签署了 200 多份政府间协定，其中中亚邻国是其优先关注的地区。2017 年，米尔济约耶夫访土 3 次、访吉 2 次、访哈 1 次，其试图通过高层会晤带动中亚邻国间关系改善的预期初步实现。<sup>①</sup>可以说，乌新政府与中亚邻国之间的互动频率之高、关系改善幅度之大、合作成果之多，远超观察家们的预期。

### 三、乌政策调整赋予中亚一体化以新动力

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将中亚地区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这意味着乌不仅将修复和改善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视为关键任务，而且还把提高中亚国家之间的整体合作水平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得益于乌直接推动及其周边政策产生的间接影响，中亚五国时隔多年后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再次召开

---

<sup>①</sup> Paul Goble, “A Year in Review: More Problems, More Reforms, More Cooperation for Central Asia in 2017”,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5, No.4, January 11, 2018.

中亚五国元首峰会，从而激活了本已销声匿迹的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如果将中亚五国克服障碍召开地区峰会视为地区一体化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次峰会就是中亚一体化进程得以重启的标志。下文将对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在中亚地区一体化重获生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简要考察。

### （一）停滞不前的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重获生机

苏联解体之初，中亚国家领导人曾有过开展地区一体化的明确意愿。各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需要借助苏联时期的联系，以实现各国之间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如中亚五国领导人在 1993 年 1 月于塔什干举行的涉及本地区重大问题商议会议上<sup>①</sup>，同意在称呼该地区时统一使用“中亚”（Central Asia，即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这一词汇，以代替苏联时期使用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Middle Asia and Kazakhstan，即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一词。<sup>②</sup>乌总统卡里莫夫曾表示，“突厥斯坦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他还提出了“通过地区主义实现全球主义”、“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不过是操两种语言的同一人种”等观点。<sup>③</sup>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更是提出了地区一体化计划，如在 1994 年苏联解体后不久，纳扎尔巴耶夫就建议原苏联国家组建“欧亚联盟”，以维持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sup>④</sup>

中亚国家不仅有过开展地区一体化的意愿，而且有过相关尝试，只是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于 1994 年成立了中亚经济联盟（CAEU），试图维系和推进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进程。1998 年该组织改名为中亚经济合作组织（CACE），同年 3 月塔吉克斯坦加入。2002 年该组织再次改名为中亚合作组织（CACO）。2004 年，

---

① 塔吉克斯坦方面因为内战，故参会者为塔议会主席，其余四国与会者为总统。

② 参见 Martha Brill Olcott, “The Myth of ‘Tsentral’naia Aziia,’” *Orbis*, Vol.38, No.4, Autumn 1994, p.549; Leila Zakhirova, “Is There a Central Asia? State Visits and an Empirical Delineation of the Region’s Boundaries”, *The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Vol.42, No.1, Summer 2012, p.34.

③ Farkhod Tolipov, “Micro-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 A Uzbekistan Perspective”, *Strategic Analysis*, Vol.35, No.4, July 2011, p.633.

④ 中亚国家参与的主要地区化倡议可参见 Keith A. Darden,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mong the Post-Soviet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65, 215.

俄罗斯加入。然而由于收效甚微，2005年10月，中亚合作组织与2000年由俄、白、哈、吉、塔组建的欧亚经济共同体（EEC）合并。<sup>①</sup>这意味着中亚国家建立一个主要涵盖本地区国家的合作机制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中亚经济联盟的夭折，似乎预示着由中亚国家创建或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很难取得成效。在此背景下，原本享有先天优势的中亚国家，非但未能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取得成绩，反而因为各国竞相优先发展与外部行为体关系，导致中亚国家的合作出现了“逆一体化”的趋势。<sup>②</sup>

随着米尔济约耶夫主政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地区一体化似乎峰回路转。如2018年3月15日，中亚五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了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哈乌吉塔四国总统出席，土则因为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出访科威特而由土议长代为与会。尽管此次会议仅具磋商性质，并没有就地区一体化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该峰会的意义在于：这是自2005年以来中亚国家第一次举行没有外部大国参与的峰会，它有望重新启动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外部观察家与中亚国家决策者，大体均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看待此次峰会。如，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这样解释召开此次峰会的动机：“为了解决中亚地区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任何第三方。我们自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是我们在一起开会的原因”。<sup>③</sup>无论能否实现目标，这种语气至少表明，中亚国家已将推进地区合作水平视为各国重要的使命。

除了动机，中亚五国召开五国峰会的时间与达成的共识，也颇具象征和实质意义。就象征意义而言，此次峰会召开时间为3月15日，即纳乌鲁兹节（每年的3月21日）前夕，而该节日是中亚国家的传统节日，相当于中国的春节。选择此时召开五国峰会，赋予此次峰会以辞旧迎新、继往开来的寓意，寄托了中亚国家期待重启后的地区合作进程能走上坦途的希望。就实质成果而言，尽管中亚五国并未深入探讨地区一体化议题，但在峰会结束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中亚五国领导人宣布，五国“渴望地区合作、相互支持和合作解决议题性问题，以确保我们地区的安全、稳定与

---

① Reul R. Hanks, *Global Security Watch: Central Asia*, Oxford: Praeger, 2010, p.125.

② 石泽：“中亚‘逆一体化’给上合带来的挑战”，《环球时报》，2013年5月9日。

③ Paul Goble, “Central Asia Ready to Move on Without Russ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5, No.42, March 20, 2018.

可持续发展”。<sup>①</sup>中亚五国还宣布，2019年它们将在塔什干再次召开峰会。在两次峰会召开期间，它们将设立一个副总理级别的五方工作委员会，以推进峰会协调与合作工作。<sup>②</sup>如果中亚地区一体化重启，未来将会采取何种机制形式还不得而知，但各国就定期召开中亚峰会达成共识本身就颇具意义，值得关注。

## （二）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一体化重获生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中亚一体化进程重获生机的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角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米尔济约耶夫推动了乌与四个中亚邻国关系的改善，促成了中亚国家间关系整体氛围的改变，从而间接为中亚峰会的召开奠定了必要基础；二是米尔济约耶夫与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一道，直接推动了五国峰会的召开。缺乏前一个方面的铺垫，很难想象中亚五国峰会在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乌总统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得到启动。下文将简要讨论乌在中亚一体化重获生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间接贡献方面，乌新政府的周边外交政策，改变了中亚国家间关系的整体氛围。因为乌在中亚地区居于中间位置，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相邻，再加上此前乌与其邻国或多或少在水资源、边界划分、应对安全威胁、如何理解乌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乌与邻国关系的好坏，具有超越双边、外溢至整个地区层面的效果。乌与邻国关系的升温，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那些可能引发国家间冲突或危及地区稳定的潜在因素，从而为地区稳定与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不仅如此，乌新政府的邻国政策，改变了中亚国家之间互信程度不高的整体氛围，并在邻国中产生了示范效应，从而带来了中亚各国之间互信水平提升、对地区合作态度变得积极等效果。据统计，仅2017年，米尔济约耶夫就与中亚四国领导人举行了17次双边与多边会谈。这些会谈增进了领导人之间的情谊和互信，促进了各国之间关系

---

<sup>①</sup> Johan Engvall, “The Reemerging Self-Confidence of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Analyst*, March 22, 2018,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504-the-reemerging-self-confidence-of-central-asia.html>

<sup>②</sup> Paul Goble, “Central Asia Ready to Move on Without Russia”.

的改善。<sup>①</sup>

在直接贡献方面，因为米尔济约耶夫的积极推动，此次中亚峰会才能应运而生。据纳扎尔巴耶夫称，是米尔济约耶夫直接提议在阿斯塔纳召开中亚五国峰会。或许早在 2017 年 9 月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米尔济约耶夫就已萌生了该想法。在联大期间，米尔济约耶夫提议国际社会帮助推进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强调“一个和平、经济繁荣的中亚，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目标和关键任务”。<sup>②</sup>米尔济约耶夫与原本就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持非常积极态度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形成共识，最终促成了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米尔济约耶夫的贡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不吝赞美之辞。如在五国峰会期间，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正因米尔济约耶夫的“不懈努力”，解决了“过去 20 多年里累积的诸多问题”，并为地区峰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sup>③</sup>有学者指出：“上周高姿态的峰会，只是米尔济约耶夫在乌兹别克斯坦掌权后，中亚地区慢慢涌现的趋向更密切协调与合作趋势的最新发展”。<sup>④</sup>2018 年的中亚峰会重启了中亚一体化进程，尽管这一进程还只是初始阶段，米尔济约耶夫也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中亚国家的尊敬。

### （三）乌新政府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所持的立场

乌之所以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与新政府对地区一体化所持的积极态度息息相关。卡里莫夫虽在话语上偶尔支持地区一体化，但在行动上冷漠甚至疑虑，米尔济约耶夫则不仅在话语上热情拥抱地区合作，而且大力贯彻到外交实践之中。如乌 2017 年 2 月公布的《2017-2021 年国家发展战略》，明确将中亚地区视为其优先外交方向，并认为乌有必要构建一个安全、稳定的睦邻带。如果中亚国家不能实现国家间合作水平的整体提升、不能通过合作解决涉及各国共同利益的地区性问题（如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恐怖主义与

---

① Umida Hashimova, “Central Asian Reset”,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5, No.43, March 21, 2018.

② Eldor Aripov, “Uzbekistan Works to Reshape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Analyst*, November 7, 2017,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477-chinas-aluminum-industrial-capacity-cooperation-in-kazakhstan.html>

③ Paul Goble, “Central Asia Ready to Move on Without Russia”.

④ Johan Engvall, “The Reemerging Self-Confidence of Central Asia”.

极端主义势力的跨国流动等), 很难想象在乌周边能形成一个“安全、稳定和睦邻带”。正因如此, 推进中亚国家之间地区合作, 也是乌周边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

乌对地区合作态度的转变, 首先体现在乌政要的话语中。在 2017 年 8 月由乌举办的“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政策主要优先方向”研讨会上, 乌外长卡米洛夫指出: “中亚一词不仅仅是指地理或地缘政治而言, 而且表明这是一个相同文化—文明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共同的历史, 以及相近的传统、习俗和社会心理”。<sup>①</sup>其言下之意是, 中亚国家开展地区合作是具有深厚基础的。卡米洛夫的态度是米尔济约耶夫立场的反映。在 2017 年 11 月举行的主题为“中亚: 相同过去和共同未来, 合作、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国际研讨会上, 米尔济约耶夫强调, 中亚各国具有相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宗教, 这为中亚国家开展友好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使这种联系为中亚国家的共同发展做出切实贡献, 米尔济约耶夫提议中亚各国从经济合作方面着手, 逐步促进各国之间的联系并实现共同繁荣。<sup>②</sup>

在 2017 年 11 月召开的会议上, 米尔济约耶夫还明确了中亚国家开展合作的六个优先领域。(1) 促进地区内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 (2) 发展地区内基础设施建设, 将中亚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 (3) 在诸如打击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跨国毒品走私等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4) 推进地区内国家之间的边界划分与勘界工作; (5) 对地区内水资源利用问题进行有效管理; (6) 发展亲密的睦邻关系。<sup>③</sup>纵观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以来所进行的周边外交工作, 可以发现, 乌在以上六个方面均开展了相关工作。如在第一个领域, 米尔济约耶夫在访问四个中亚邻国之时, 均将促进与所访国家的经贸关系作为其访问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乌的推动下, 2017 年乌与其他中亚四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 30 亿美元, 相较 2016 年增长了 20%。<sup>④</sup>至于在其他领域, 乌均有外

---

① 李自国: “乌兹别克斯坦”, 第 294 页。

② 赵常庆: “中亚国家一体化有望重启”, 载孙力、肖斌主编: 《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8)》,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第 99-100 页。

③ Umida Hashimova, “Central Asian Reset”.

④ Johan Engvall, “The Reemerging Self-Confidence of Central Asia”.

交举措，如与吉签署边界协议、与吉塔达成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协议等，为推进地区合作做出了贡献。如此，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亚五国峰会能够举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 四、中亚一体化重启面临的挑战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乌兹别克斯坦不仅改善了此前与中亚四国或多或少的紧张关系，而且还直接和间接地促成了中亚峰会的召开。与此同时，这种动向也带来了新的疑问，即，如果中亚国家选择重启地区一体化进程，它们能否避免重蹈覆辙，深入推进该进程？尽管目前难以对这一问题给出确切的回答，不过可以预料，即使中亚一体化进程得以重启，其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下文将结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调整，从乌外交政策发展方向、中亚国家间复杂关系与域外大国的压力这三个方面，就中亚地区一体化面临的挑战进行简要分析。

##### （一）乌外交政策的持续性与不确定性

自米尔济约耶夫主政以来，乌内政与外交政策均发生了诸多变化。在内政方面，米尔济约耶夫在调整政府机构和更换政府官员、加大反腐力度、启动法律与司法改革、促进权力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增强政府服务民众的意识、推动经济自由化、放松对社会和媒体的管控、推进宗教宽容与族际和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而使乌国家面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民众对政府改革的预期等发生了许多明显变化。<sup>①</sup>在外交方面，乌新政府将推进与邻国之间的合作作为优先方向，并积极与域外国家，尤其是大国加强友好与合作关系。2017年，米尔济约耶夫出访了俄罗斯（4月4-5日）、中国（5月11日至15日），并在联大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晤。

---

<sup>①</sup> 关于乌国内政策调整的相关研究成果参见 Anthony C. Bowyer, *Political Reform in Mirziyoyev's Uzbekistan: Elec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Silk Road Paper, March 2018; Mjuša Sever, *Judicial and Governance Reform in Uzbekistan*,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Silk Road Paper, March 2018.

上任仅一年多时间里，米尔济约耶夫便实现了与中俄美三大国元首的会晤。由此可见，乌对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力度是相当大的。

米尔济约耶夫之所以对乌内政与外交政策进行如此多的调整，是为了解决卡里莫夫总统遗留下来的问题，改善乌内政与外交局面，从而巩固其地位和合法性。如前所述，在外交政策方面，虽然卡里莫夫总统实施的自主和不结盟外交政策，为乌在平衡与域外大国关系的过程中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推进国家建设和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对国家主权的过分珍视，使乌显得有些许孤傲，客观上也导致了乌与其邻国关系不畅。<sup>①</sup>卡里莫夫总统留下的这种外交遗产，尤其是此前乌与邻国关系起点较低的状态，客观上为米尔济约耶夫迅速打开乌外交局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然，米尔济约耶夫本人的外交理念及其付出的诸多努力，才是乌周边外交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直接原因。乌与其他中亚国家关系的显著改善，展现了米尔济约耶夫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有助于巩固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其国际合法性。

国内外学术界均意识到并承认乌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不过，对于这种变化是性质上的还是程度上的，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S·弗里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认为，米尔济约耶夫主导下乌内外政策的创新程度或调整速度，是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来前所未有的。<sup>②</sup>这属于性质上的变化。但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焦一强副教授则认为：“‘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的调整，既不是原则性的根本改变，也非深刻的重新定向”，而是“在继承首任总统外交政策基础上的微调，是继承与超越的有机结合，而非根本‘决裂’”。<sup>③</sup>笔者认为，米尔济约耶夫对乌外交政策的调整，虽不是与卡里莫夫时期外交政策的“根

---

① 对乌外交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赵会荣：《大国博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战略设计》，香港：光大出版社，2007年；Matteo Fumagalli, “Ethnicity, State Form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Uzbekistan and ‘Uzbeks abroad’”,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1, pp.105-122。

② S. Frederick Starr, “Preface”, in Richard Weitz, *Uzbekistan’s New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under New Leadership*, p.5.

③ 焦一强：“‘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第123页。

本决裂”，但其调整幅度已超过“微调”的范畴。这主要是因为，尽管乌新政府并未改变其不结盟、不干预他国内政、拒绝在本国部署他国军队等核心外交原则，但从米尔济约耶夫对改善与邻国关系的重视、对加强与域外大国关系的热情、对开展元首外交所展示出的积极性、对外部世界持有的更开放态度等表现来看，乌政策调整同时涉及外交政策目标（改善乌外部环境、提高其国际威望与国际合法性）、外交手段（重视首脑会晤与顶层设计的作用）和国际取向（对外部世界的信心增强，使乌变得更为开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实际上是外交政策性质发生了变化，而非仅仅是政策微调。

不过，有待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是，乌外交政策调整能否持续？调整究竟能走多远？目前，乌外交政策仍处于调整阶段，方向虽然明确，但步伐、力度能否持续却面临不小的变数。就步伐而言，其他中亚国家不一定能跟上乌外交政策调整的步伐，并始终对乌提出的政策倡议做出积极反应。此外，目前乌新政府的政策调整步伐似乎有些过快，引发了部分观察家的忧虑，认为这种过快过大的调整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sup>①</sup>就力度而言，乌周边政策和地区合作政策能否顺利推进，则受到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执政地位是否巩固、能否始终将发展与中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作为优先任务、下属机构能否顺利和持续地贯彻总统外交思路等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乌可以通过政策调整较快地修复与其他国家已存在的问题，但乌协同其他中亚国家开创出一条新的地区一体化路径却没有那么容易，其演变方向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乌外交政策调整方向、步伐、力度等因素的牵制。

## （二）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地区身份形成的不易

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对外交政策所做的调整，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合作氛围，这是中亚地区一体化重获生机的直接原因。但中亚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望各国在短时间内就地区一体化达成重大共识并

---

<sup>①</sup> Paul Goble, “Will the ‘Uzbek Gorbachev’ Succeed-or Be Allowed To?”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5, No.30, February 27, 2018; Farkhod Tolipov, “Uzbekistan between a new president and the same nation: is it perestroika?”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Analyst*, January 10th, 2017,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418-uzbekista-n-between-a-new-president-and-the-same-nation-is-it-perestroika?.html>

迅速加以推进,是不切实际的。主要原因在于,此前导致中亚国家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的部分原因,仍然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此造成了消极影响。在乌新政府调整了其周边政策后,导致中亚国家间关系不睦的部分负面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如哈乌两国及其领导人在地区主导权方面的竞争、各国之间难以处理的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问题、三股势力跨国活动造成的各国相互猜忌等。<sup>①</sup>然而,另外一些导致中亚地区一体化步履维艰的因素,却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如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外交政策取向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繁多导致“制度过剩”问题、各国基于历史经验对地区一体化所持的慎重态度,等等。这种希望与障碍并存的局面,意味着中亚地区一体化要取得突破性进展,仍是一个需要付出诸多努力的过程。

事实上,即使中亚国家间关系取得了大幅度的改善,但这种改善依旧是有限度的。仍以乌与其他中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为例。虽然乌新政府在领土划分、水资源分配(包括塔吉两国建设水电站)等问题上的立场已明显软化,并采取了具有较多合作性特征的政策,不过这种政策仍有其脆弱性。如在塔罗贡水电站的建设问题上,乌不再继续持反对立场、甚至愿意为该水电站的建设提供帮助的态度虽然激活了乌塔关系,但这种政策改变所带来的成本也不容忽视。有学者就指出,乌立场的改变,不仅面临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反对的巨大压力,而且由于放弃了此前坚持的立场,导致乌政府脸面受损,使其

---

<sup>①</sup> 如对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因素的分析可参见 Inomjon Bobokulov, “Central Asia: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6, Vol.25, No.1-2, pp.75-91;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2, pp.185-202; Kathleen Colli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among 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2, pp.249-281; Alexander Libman and Evgeny Vinokurov, “Is it Really Different? Pasterns of Regionalisation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1, Vol.23, No.4, pp.469-492; 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32-50页。

丢了大国的“面子”。<sup>①</sup>在吉水电站兴建问题上，乌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与损失。<sup>②</sup>目前看来，乌采取了一种暂时不顾及脸面丢失，而力争通过参与水电站建设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舍名取实立场，但此立场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

领土问题与此类似。尽管乌与其邻国之间的领土划分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毕竟各国争议领土犬牙交错（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要彻底完成对这些领土的划界仍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值得庆幸的是，中亚国家之间并未因为领土争议而发生类似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那样的国家冲突。<sup>③</sup>而且乌最近所展示的自我克制和积极合作姿态，有助于各国形成一种通过协商或谈判解决领土争议的氛围。然而，始终不能排除中亚国家发生国家间领土摩擦甚至争端的可能。即使乌在边界与水资源利用问题上始终保持克制，它也无法保证其他中亚国家之间不会发生矛盾甚至冲突。如2017年11月哈吉两国因为总统候选人问题所产生的外交龃龉、2018年4月初吉塔两国发生边界摩擦之类现象的出现，可能导致中亚国家间关系再度趋紧，进而可能给各国重启地区一体化的努力造成困扰，严重时甚至可能打断此进程。或许正因为意识到急切之间推进地区一体化存在诸多困难，中亚元首峰会并未就地区一体化的目标、时间表、可能采取的机制形式等重大问题做出明确规划。

更重要的是，中亚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中亚各国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集体身份。2018年3月中亚峰会的召开，得益于哈乌之间的合作与配合。而选定在阿斯塔纳召开此次峰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各国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长期坚持推进地区一体化立场的一种致敬。纳扎尔巴耶夫对中亚地区合作必要性的一贯强调，与米尔济约耶夫的外交思路总体契合。在此背景下，

---

① Edward Lemon, “Signs of improving relations between Uzbekistan and Tajikistan but tensions remain,” October 19th, 2016,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Analyst*,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405-sings-of-improving-relations-between-uzbekistan-and-tajikistan-but-tensions-remain.html>; Farkhod Tolipov, “Uzbekistan-Tajikistan: game over, but what is the score?,” December 15th, 2016,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Analyst*,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415-uzbekistan-tajikistan-game-over-but-what-is-the-score.html>

② Umida Hashimova, “Uzbekistan and Kyrgyzstan Undertake Resolving Their Water Disputes”,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4, No.131, October 17, 2017.

③ Farkhod Tolipov, “Ad-hoc peace or ad-hoc war: micro-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June 2nd, 2016,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Analyst*,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367-ad-hoc-peace-or-ad-hoc-war-micro-geopolitics-of-central-asia-and-the-caucasus.html>

首届峰会才得以顺利举行。有学者预言，乌哈在中亚一体化过程中的携手合作，有望形成类似于法国和德国在欧盟一体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双引擎”机制。<sup>①</sup>然而，即便哈乌两国对启动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共识，但中亚五国要形成一种地区身份认同，仍需做出诸多努力。例如，哈萨克斯坦除了强调推进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必要性，同时也重视欧亚空间的一体化。哈在这方面的立场，与塔吉两国相似。它们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机制的参与，是对欧亚地区身份认同的一种体现。而根据乌目前对这两个地区合作机制的态度可以发现，它更重视的是中亚地区的身份而非欧亚地区的身份。土库曼斯坦则奉行“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对各种地区一体化机制敬而远之，这或许会影响到地区一体化的进程。<sup>②</sup>土库曼斯坦议长而非总统出席此次峰会，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对重启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谨慎态度。

集体身份的缺失，将是阻碍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突破的深层因素。虽然中亚五国参加了2018年3月的中亚峰会，但它们对中亚地区身份的认同仍有程度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未形成一种认同彼此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认同的缺失，将会对中亚一体化的顺利启动或推进产生长远的阻力。由于“各国并未打造出一种集体身份，中亚仍处于机制化远远不足（under-institutionalized）的状态。”事实上，根据当前世界对“地区”（region）的界定标准，在中亚地区这种集体身份并不存在。这会吸引外部大国提出它们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分而治之的战略推进这些方案，自然也就令中亚国家提出的一体化倡议陷入动力不足甚至无功而返的境地。<sup>③</sup>

### （三）如何处理中亚地区一体化与外部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中亚地区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域外大国参与中亚事

---

① Johan Engvall, “The Reemerging Self-Confidence of Central Asia”.

② 对土奉行永久中立外交政策原因及其影响的讨论，可参见 Utku Yapıcı, “From Positive Neutrality to Silk Road Activism? The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in Turkmenistan'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2018, Vol.20, No.3, pp.293-310.

③ Bilahari Kausikan, S. Frederick Starr and Yang Cheng, “Central Asia: All Together Now”, June 16, 2017, *The American Interest*,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7/06/16/central-asia-all-together-now/>

务自然有其合理性，而且它们往往在话语上鼓励中亚积极开展地区合作。然而，诸多外部行为体的存在及其实施的强调双边而非多边的政策，客观上对中亚一体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前，这种影响至少通过两种机制发挥作用：

(1) 诸多大国的存在，为中亚国家利用大国竞争而非推动地区合作以获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削弱了他们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动力或信心；(2) 在乌与其他中亚邻国关系不睦、乌哈两国试图争夺地区主导权、乌周边政策有进攻性的背景下，其他中亚国家有强烈的动机借助域外大国对其进行牵制。<sup>①</sup> 随着乌周边政策的调整，第二种机制已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第一种机制仍然存在，它仍可能对中亚国家启动地区一体化进程构成牵制。无论是否启动或采取何种方式启动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亚国家如何处理与外部大国之间的关系，将始终是一个影响该进程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问题。

至少从目前来看，中亚国家仍然强调独立于域外大国开展地区合作进程的必要性的重要性。如纳扎尔巴耶夫在峰会上对中亚地区合作不需要“第三方”的强调，便是这种取向的体现。然而这种雄心能否实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前中亚合作组织的消亡，表明由中亚国家组建的地区合作机制存活与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如斯塔尔等人就认为，中亚合作组织之所以于2004年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原因包括：成员国面临的财政困难和组织收效甚微、土库曼斯坦置身事外、西方国家漠不关心、俄罗斯反对并非由其控制的地区合作机制存在等原因。<sup>②</sup> 如果将上述因素加以总结可以发现，中亚合作组织的不复存在，可归结为中亚国家的投入和信心不足、外部行为体不能为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这双重原因。如果中亚国家有意重启地区一体化进程，且下定决心避免重蹈覆辙，那么，改变内部动力和信心不足的状况是有希望的；然而，作为外部因素的大国竞争在当前似乎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目前均未对中亚国家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初步尝试做出明确反应。不过，就两国在该地区实施的政策来看，形势似乎不太乐观。中亚国家虽然宣称致力于在摆脱外部影响的情况下，使地区一体化重现

---

① 可参见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第49-50页。

② Bilahari Kausikan, S. Frederick Starr and Yang Cheng, “Central Asia: All Together Now”.

生机，但与此同时，各国并未对大国推动的地区合作机制采取排斥的立场。以美俄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为例：五国均是独联体成员、哈吉两国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哈吉塔三国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五国均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出的“中亚五国+美国”（C5+1）合作机制。由于中亚五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他们积极发展与美俄的双边关系，并选择性地参与由两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如果域外大国不鼓励甚至反对中亚国家组建排他性的合作组织，那么中亚各国将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平衡自主推进地区一体化与参与由域外大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如果学者们有关俄罗斯反对中亚国家组建涵盖中亚国家合作机制的判断属实的话，那么可以预料，中亚国家重启地区一体化的努力，将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巨大压力。如此一来，中亚国家能否有意愿或能力抵御这种压力，将是决定中亚一体化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美国由于一直宣称其中亚政策的目标在于保障和促进中亚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可能会乐见中亚地区一体化取得进展，并希望借此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如美国知名中亚问题研究专家史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认为，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和推动地区合作的尝试，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是个重要的机会。因为“中亚国家间合作，尤其是哈乌之间的合作，加强了这些国家相对于莫斯科和北京的经济独立性，以及它们的整体国内能力与地区稳定。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一贯借助美国作为离岸平衡手，以牵制两个具有帝国野心(imperially minded)的邻居”。<sup>①</sup>基于这种零和博弈或称“新大博弈”的思维<sup>②</sup>，美国并未将中亚国家通过地区一体化实现繁荣与发展视为一个目的，而是将此视为美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机会。而且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以阿富汗为中心来整合中亚和南亚地区，这与中亚国家希望实现本地区整合的目标明显相悖。美之所以鼓吹中南亚一体化，

---

① Stephen Blank, “Central Asia: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rch 22, 2017,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Analyst*,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435-central-asia-an-opportunity-for-the-trump-administration.html>

② Alexander Cooley, *Great Games, Local rules: The New Power Contest in Central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其目的包括企图实现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影响、加强与印度之间的战略合作、从阿富汗抽身等目标。总之，无论是“新丝绸之路”计划，还是“C5+1”机制，美国希望推进的是其青睐或由其控制的整合方案，而非中亚国家自主主导的一体化方案。在美俄均有各自偏好的地区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亚国家能否避免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凝聚出强大的内生动力以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仍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 五、余论

米尔济约耶夫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将改善与发展与中亚地区邻国之间的关系作为乌外交政策最优先的目标。通过积极贯彻调整后的中亚地区政策，乌与中亚邻国之间的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不仅使乌与中亚四国的双边关系得到迅速升温，而且为中亚地区一体化的重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乌政策调整使中亚地区一体化重获生机，但由于乌国内外政策的调整仍未完成、中亚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统一的集体身份困难重重、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所持的立场不明朗等原因，这种趋势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

本文主要就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以来对乌兹别克斯坦邻国政策所做的调整，及乌为推进中亚地区一体化所做的努力，做了简要讨论。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对乌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不过，管中窥豹，通过本文的分析，大致可以发现米尔济约耶夫调整内外政策的主导思路。这种思路即同时启动内政与外交改革，使之相互促进、互为助力。其中，内政改革的目标是缓解乌兹别克斯坦积累的矛盾，增强社会的开放和包容程度，改善乌的经济处境。一言以蔽之，改革旨在增强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能力。外交政策调整的目标，则是改善乌兹别克斯坦与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优化乌的国际形象，最终为其国内政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就其最终目标而言，无论是内政改革还是外交调整，都离不开米尔济约耶夫巩固自身执政地位和权力基础的考虑。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因为截至目前，乌新政府并未就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权力进行深层次的改

革。换言之，尽管米尔济约耶夫可以展示自身亲民、务实、睿智、专业等形象，尽管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一个国家可能变得更为开放、更为廉洁，经济更富活力、外交政策更趋活跃、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只要乌兹别克斯坦政治制度未出现根本性变化，那么，米尔济约耶夫推进的改革，始终摆脱不了服务于其个人积累政治资本和巩固权力基础的猜测。而且，只要乌的改革未涉及权力分配这一领域，那么，米尔济约耶夫就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和国内外对乌改革的反应，酌情对改革进程采取或加速，或减速，或中止，或逆转等不同策略。因此，对乌内政与外交的调整方向做出一锤定音的判断或准确预测，仍存在不少困难。当然，至少就目前来看，米尔济约耶夫的改革仍在推进过程中，短期内有望持续。

就目前来看，乌调整外交政策的努力得到了外部世界的积极反馈。对乌改善与其邻国关系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在中亚地区得到的热情回应，本文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至于乌改善与大国关系的尝试，也得到了各大国的正面评价。截至 2018 年 6 月，米尔济约耶夫已实现了对俄美中三大国的国事访问。通过这些外交互动，乌兹别克斯坦与这三国之间的关系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或提升。以对美关系为例，美乌合作关系得以强化的典型事件，是米尔济约耶夫 2018 年 5 月 15-17 日对美国进行的正式访问。这也是 2002 年以来乌总统时隔 16 年之后再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美乌双方签署了《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国：开启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时代》的文件，而且就两国开展军事合作（包括就乌兹别克斯坦购买美国武器和装备）取得一致。此外，双方还签署了合作金额达 50 亿美元的商业合同。<sup>①</sup>事实上，虽然各大国也对米尔济约耶夫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能否延续有所疑惑，但整体而言，它们均对乌实施更为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表示肯定和欢迎。

就中国而言，对乌调整其邻国政策及中亚地区一体化所取得的进展，中国持乐观其成的态度。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乐见中亚国家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进展。这是因为，中亚国家间关系的状态，不仅对该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政局稳定产生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西北稳定息息相关，

---

<sup>①</sup> White Ho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Uzbekistan: Launching a New Era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May 16,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united-states-uzbekistan-launching-new-era-strategic-partnership/>

故中国一贯支持中亚国家携起手来努力解决地区内部的问题,并希望各国能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根据经验可以发现,中亚国家间关系发展不畅与紧张,不仅阻碍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合作水平的整体提升,而且也不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分裂主义等的跨国威胁。如果中亚国家能够依靠自身团结推动地区合作水平提升和解决地区问题,中国也将在此过程中受益。

事实上,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亚国家推动地区合作提供了一定基础。通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互动,四个中亚成员国不仅与中国和俄罗斯积累了较多互信,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增进了了解、提高了互信水平。而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过程中,中亚国家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深化各国在政治层面的互信以及加强政策层面的协调等方面收获颇丰,这为它们推动中亚地区一体化取得成效做出了贡献。

---

**【Abstract】**After Mirziyoyev was inaugurated as president, Uzbekistan has considered restoring and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its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as its diplomatic priority. Through adjusting its Central Asian polic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zbekistan and four other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has been improved markedly. This improvement has laid a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the resumption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Nevertheless, uncertainties still exist for future Uzbekistan's foreign policies. Actuall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among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lead to difficulties in forming a collective identity. Besides, outside powers hold unclear positions towards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All of these lead to many uncertainties of the revitalized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 Key Words 】** Uzbekistan Diplomacy,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Mirziyoyev,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ирзиёев занял пос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Узбекистан взял курс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осе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что стало

первоочередной целью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Благодаря такой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е политик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и четырьмя соседн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заметно улучшились. Данного рода улучшения вновь заложили необходим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днако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в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лож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 также неясная позиц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ржав по вопросу интеграц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ивели к трудностя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процессе интеграц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по-прежнему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ного переменных.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дипломат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ирзиёев, пять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责任编辑 肖辉忠)